

关联理论语境下的文化移情

杨春春

(南京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7)

摘要:由于文化背景、思维模式等方面的差异,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往往倾向于根据本族文化背景和由该背景决定的解码方式来理解信息,因此说话人的信息会按照受话人的想法被加工和改变,不同的文化语境导致交际双方对同一客观信息有不同的理解,从而无法达到有效交际。文化移情要求交际者从对方的立场出发来推测对方的思维和处境,从而填补交际双方的语言信息空缺,推理出对方不能直接表达或者自己未能彻底理解的话语含义,因此文化移情对于跨文化语境的构建、实现交际中的最佳关联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关联理论;语境;文化移情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3)03-0065-05

文化移情是跨文化交际能力中最关键的因素,直接影响到跨文化交际的过程和结果。它立足本民族文化,却又能突破其桎梏,放眼并尊重异族文化,是民族间沟通的桥梁。适度的文化移情能够有效的促进跨文化交际。国内外对于文化移情概念的重要性也日趋关注。Bell(1987)、Broom(1991)、Weaver(1994)、Smaovar & Porter(2001)、Brunner(2003)及国内的胡文仲(1994,1999)、贾玉新(1997)、顾嘉祖(2000,2002)、高永晨(2003,2005,2006)、陈二春、袁志明(2008)等人分别从各自角度对文化移情能力进行了研究和阐述。本文拟从关联理论语境观出发,阐述跨文化交际中由于社会传统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交际双方会在信息编码和解码方面表现出信息偏差或者空缺现象,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继而探讨了文化移情对于跨文化语境的建立和实现有效交际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文化移情

“移情”概念是由德国美学家罗勃特·费肖尔于1873年提出,最早应用于美学领域,渐渐扩展到其他文化领域。日本语言学家 Kuno 将其引入了语言学界,指出移情即“说话人将自己认同于他用句子所描写的事件或状态中的一个参与

者”^[1]。美国学者 Ruben 则进一步阐述了移情的目的和方式,说明移情是交际主体通过言语和非言语行为,向交际对象表示已经充分理解他的思想和感情^[2]。国内对于文化移情的研究始于何自然在1991年发表的《言语交际中的语用移情》一文,他认为,语言习得者应该理解和感受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并且将自己置身对方文化背景中进行语言学习及运用^[3]。高永晨指出,所谓文化移情,就是交际主体自觉地转换立场,在交际中有意识地超越本土文化的俗套和框架模式,摆脱自身文化的约束,置身于另一种文化模式中,如实的感受、领悟和理解另一种文化,是一种为了保证不同文化之间顺利沟通而进行的心理体验、感情位移和认知转换^[4]。

文化移情是一种站在其他民族文化立场上思考的心理倾向,民族中心主义以及成见是文化移情的两大障碍。民族中心主义的理念认为自己的文化优于他文化。从广义上说,就是轻视其他群体的成员。美国社会学家孙墨楠是这样定义民族中心主义的,“以其个人所属群体为一切事物的中心为出发点来看待事物,对其他所有群体则按照自己的标准把它们分成等级……每个群体都认为只有自己的社会习俗是恰当的,看到别的群体有不同的社会习俗,就会嘲笑”^[5]。民族间的文

收稿日期:2013-08-09

作者简介:杨春春(1980-),女,安徽舒城人,讲师,硕士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与英语教学。

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文化移情的产生基础。不同的社会文化和传统会导致族人价值观、风俗观、道德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至于成见,萨姆瓦指出,如果不能区分不同交际主体及其所在的不同文化,人们就会容易用多种途径来把复杂的感知简单化,其中一种情况就是用一组特性去表示整个群体的特征,而且这个群体内的所有成员都具有这些特性,这种没有考虑个体特征而只认定整个群体的情况就是成见^[6]。成见拒绝改变和妥协,是一种僵化的观念,严重影响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移情的进行。因为移情要求交际主体面对文化背景不同的交际对象时,远离自我为中心的想法,设身处地的从交际对象的角度出发,认真了解研究交际对象的价值观、风俗及思维方式。只有克服以上两点障碍,才能保证文化移情的顺利实现。

移情的概念及过程是深刻和复杂的,远不是一个简单的变数或者是因数,因此研究移情过程中所具有的潜在功能是十分必要的。布鲁姆认为,文化移情可以从两个层次来探讨,第一层次为感情基础,肯定自己的积极情感并能够积极掌控自己的情感,避免对他人持有偏见或者刻板的态度;第二个层次为认知层面,包括理解和区分自我和别人间的逻辑、意图、思维方式、批判思维以及修辞可能性^[7]。顾嘉祖认为,移情应该被分为知觉技能和交际技能,不但牵涉到对他人情感的察觉和认识,也包括对这些情感进行适当的回应^[8]。文化移情要求深受本族文化影响的交际者尽最大努力去摆脱这种影响,并且尽量尝试通过异族文化的思维模式去考虑问题,从而在不同文化中找到平衡点。

二、关联理论语境下的文化移情

文化移情要求交际主体能自觉转换文化立场,有意识地超越本土文化,牵涉到个人认知心理的方方面面。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移情体现在两个层面,即言语移情和社会语用移情。前者是以语言自身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其在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进行加工及交互的过程,即说话人通过语言有意识的向听话人表达自己的情感与目的,以及听话人是否能够准确揣测说话人的言语意图的编码——解码过程;社会语用移情则是从宏观角度出发,将着眼点放到交际双方的社会文化背景、传统、风俗习惯及言语意图。社会

语用移情要求交际双方对于交际对象的社会文化抱有积极肯定的态度,由己及人,将心比心,体验他人的真实情感。文化移情的这两个层面和关联理论所提出的明示——推理交际概念是吻合的。

关联理论由 Sperber 和 Wilson 于 1986 年提出,用来解释明示——推理交际^[9]。关联原则本质上就是一条交际原则,明示和推理是交际过程中涉及的两个方面:从说话人的角度来说,交际是一种示意过程,说话人要明确言语意图,并结合语境,采用适当的言语和非言语手段将这一意图传递给听话人;从听话人角度来看,交际是一种推理过程。明示指说话人通过直白的语言来表明目的,听话人无需进行特别复杂的推理就可以理解说话人的意图。然而话语除了直白之外,很多时候通过暗示的方式表达出来,在这些话语中,新信息会影响听话人的语境假设。关联理论认为,语境是一个由大脑中一系列假设构成的心理结构体,在言语交际中,话语的理解就是从语境中选择最相关的假设,以便使用最小认知处理努力来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10]。因此,语境在人们理解言语中出现的新信息时非常重要,它会帮助听话人通过认知推理的过程,在语境假设之间寻求关联。

在跨文化交际中,信息接受主体由于受到自己长期生活在其中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甚至成见的影响,往往倾向于有意或者无意的依据本族文化背景和该背景决定的解码方式来理解信息,因此信息发出者的信息就会按照接受者的想法被加工和改变,不同的文化语境导致交际双方对同一客观信息有不同的理解。首先,说话人本来的信息意图在另一种文化语境中可能会失去其明示的功能,假如听话人不能做一些理解策略上的调整,就会导致其无法理解说话人的意图而导致交际障碍。其次,听话人在理解语言的推理过程中需要调动自己头脑中已有的百科信息来帮助构建相关联的语境假设,但是由于说话人和听话人两者的认知语境可能会大相径庭,听话人缺失构建关联的必要的百科信息或者其已有的百科信息与说话人的意图有所冲突,无法顺利完成交际。从本质上讲,理解话语信息包括听话人对于语境假设的不断选择、调整和顺应。而对语境的顺应恰恰是文化移情中十分重要的一环。顺应是指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而原有认知结构无法同化新环境提供的信息时引起个体认知结构发生重组与改造

的过程,认知个体就是通过同化与顺应这两种形式来达到与周围环境的平衡^[11]。英国语言学家 Michael Byram 认为,跨文化交际双方总是处于本族文化与异族文化之间,并能随机应变,解释交际过程中的文化现象^[12]。这种类似于中介的功能不会存在于交际双方任一方的语言或者文化里,而是需要双方以语境为参照,有意或无意的激活相关信息,适度顺应对方文化背景、社会心理,在共同构建的跨文化语境中确定语言的真实意义,推进交际的线性发展。因此,跨文化交际的过程是一个通过文化移情努力来重建关联的过程。

(一) 文化语境中的文化移情

文化语境是指说话人所在的言语社团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人情,属于该言语社团的人一般都能够理解其在语篇中的意义和意图,实现语篇的连贯^[13]。文化语境对于跨文化交际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交际主体共同享有的机构及意识形态等领域的背景知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和传统观念,人们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中,头脑中的民族意念根深蒂固,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易受本族文化的干扰。首先,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存在较大的不同。受到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影响,西方人比较严谨,注重逻辑性,价值观偏向个人本位,在意自己的隐私保护;思维方式呈直线型,语言表达上较为直接干脆。而东方文化,例如中国,价值观偏向集体本位,见面时喜欢以双方的家庭、工作等作为寒暄的话题是常见现象;思维呈螺旋性,说话喜欢绕弯子,不直接切入主题。例如,当两个中国人相遇时,经常会用“吃饭了吗?”(Have you had your meal?)或者“你上哪儿啊?”(Where are you going?)来表示问候,但是在西方国家,这样的问候却是十分不妥的,因为询问西方人是否吃过饭,会被认为向其发出邀请的信号;至于个人的去向更是比较私人的情况,因此直接询问,会使交际对象感到迷惑甚至不快。“How are you?”、“The weather is fine, isn't it?”这样无关个人的话题才是适合西方文化的问候方式。其次,两种文化语境对于礼貌和等级也有不同的准则。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有发达的礼貌语言体系,文化传统中历来以贬己尊人的谦谦君子作为标杆,反感过分张扬,不愿意外露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例如中国人在面对赞美时喜欢说“过奖了,其实我也就那样”等诸如此类的话语;在赠送礼物给别人

时,即使是自己特意挑选的昂贵物品,也经常会说:“不值钱的小东西,略表心意。”但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常常对自我持有肯定性的感情,对别人的赞扬比较得体的回应是大方接受并且表示感谢。在馈赠礼物时,西方人会强调“特意为您准备的”。另外,汉民族文化对于等级十分重视,强调长幼有序,上下有别。严格的等级观念要求人们重视伦理,对于语言的使用有必要的制约。而西方文化崇尚人人平等的观念,追求竞争和冒险,对于等级差别并不在意,甚至对长辈也可直呼其名。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会造成交际双方交际上的障碍。请看下例:

A:明天放假。

B:真的啊?谁通知的?

A:(手指向面前的老师)他说的。

在上面的对话中,A是一名来自西方的留学生,整个交际中的语言信息传递完整,但是文化语境上出现了偏差。在汉民族的文化语境中,当尊长也在现场时,不能使用第三人称来指代尊长,而是应该使用尊称。A对于老师的称呼有疏于礼貌之嫌,可能会让老师对其产生一定的负面印象。但是如果这位老师对于西方文化语境有所了解,就可以在“学生是否尊重我?”这两种信息假设中选择顺应对方的文化语境而释然。因此在跨文化交际时,如果不能适时地进行文化移情,将自己置身于对方的社会背景中,在多种假设中自觉的选择顺应对方的文化语境,就会造成一些尴尬的现象发生。

需要指出的是,在跨文化交际中,两种文化没有孰优孰劣之分,交际双方只要以平等的心态交互移情体验,防止民族中心主义的干扰,处理好本土文化和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就能找到两种文化语境的平衡点。

(二) 认知语境中的文化移情

认知语境是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不断选择的结果,是受话人在听话过程中对于言语的自我构建,不是在理解过程之前就固定下来的,这和传统语境是不变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认知语境的概念超越了客观的情景语境或上下文、交际场合等言语自身语境,指的是人对客观世界通过认知而形成的一系列知识或假设,其两个基本操作单位是知识草案和心理图式^[14]。知识草案是人对外部世界和客观事实经验化的集合,是比较固定的概

念。而心理图式的范围较广,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较大,在构建跨文化交际语境中,百科知识、逻辑和语言本身都会帮助听话人建立与当前话语信息相关的语境信息或者假设,进而使其借助关联性来推理说话人的真实目的。寻求最佳关联的过程就是根据话语所提供的信息去理解话语的推理过程。在这个推理过程中,听话人通过一系列的语境假设来处理说话人的信息,从而获得新信息或者新假设的语境效果,结合语境来理解说话人的交际目的。有时言语交际的主要信息不是通过明示的语言来传达的,因此通过推理将话语本身的语义信息和交际情景结合起来,就可以明了其内在的语用信息。对于推理过程所需要的认知加工努力的大小,可以通过一个经典的公式予以表示:

$$\text{Relevance(关联)} = \frac{\text{Contextual effect(语境效果)}}{\text{Processing effort(努力程度)}}$$

这个公式体现了关联、认知语境和认知加工三者之间的关系:关联与认知语境成正比,而与认知加工成反比,即语境效果越大,关联度越大。如果认知加工努力程度大的话,则说明关联度小。将该公式运用到文化移情的领域内,可以发现文化移情能力会直接影响交际主体顺应语境的能力乃至影响跨文化交际的全过程。文化移情的努力程度和关联成反比,和语境效果成正比。交际双方的语境越趋同,文化移情的努力程度就越低;双方的语境越迥异,移情努力就会越大。

Philip R. Harris 指出,沟通的过程涉及到信息发出人、信息接受人和言语信息本身,是循环的相互影响的过程,信息发出人和接受人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信息通过某一媒介或者信号得以传递,这一媒介可以是语言的,也可以是非语言的^[15]。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在趋同语境构建中经常会遇到两个障碍:第一,如上文所提到的,跨文化交际双方的社会文化、生活背景和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使听话人会有意或者无意的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对说话人所传达的信息进行解码,从而使交际双方对同一客观信息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另一方面,由于听话人对说话人的社会文化背景了解程度有限,所以其认知语境往往小于说话人语言信息中已有的认知语境,导致听话人无法理解说话人做出的信息预设,影响跨文化交际的进行。例如当一位中国顾客去国外的商

店购物时,店员走过来用询问的语气说:“Yes?”这时的“Yes?”并不是简单的字面含义“是?”,而是该国的一种购物接待传统,表达的是“Can I help you?(请问您想买点什么吗?)”的含义。如果顾客熟悉该国购物习俗,通过文化移情努力,正确理解“Yes?”的实际含义,才能做出合适的回应,即告诉店员自己想购买的物品,顺利达到双方的交际目的。同样,“Cheers”在英语词汇中的常见含义为“干杯”,但是在英国很多地方,“Cheers”还可以表示“谢谢”的意思,相当于“Thanks”,试想如果没有相关语境的铺垫,听话人肯定会非常的困惑不解。

文化移情强调远离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对于跨文化语境的构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帮助交际双方从对方的立场出发来推测对方的思维和处境,尊重交际对象的文化传统及价值观等,顺应对方的思维方式,从而填补交际双方的语言信息空缺,使双方互相体谅,来推理出对方不能直接表达或者自己未能彻底理解的话语含义。请看下面的两个例子:

(1) A: Hurry up! We have made the appointment with Ms. White at four o'clock.

B: Have you noticed today is the last Sunday in October?

A: ? (Puzzled)

A 是外国留学生, B 是英国本地人。A 提醒 B 四点的约会不能迟到,但 B 语境中的蕴含信息大于 A 的认知语境,因为每年 10 月最后一个星期日英国开始实行冬令时,时钟调慢一小时,因此 B 的意思是时间还很充足,他们无需匆匆忙忙赶赴约会。但初去英国的 A 缺少对英国冬令时的必要认知,无法对 B 言语中的信息进行有效的推理,交流出现了障碍。B 应该在其问句后加上对于 10 月最后一个星期天是冬令时开始的信息解释以进行文化移情,来帮助 A 理解其言语意义。

(2) A: As to the choice of the future husband, Jane has no rights in her Victorian family.

B1: Really? Why?

B2: Oh, I really show my sympathy to her.

A 来自英国, B 是外国人。对话中的 Victorian family 是需要听话人进行文化移情努力的关键。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中男性占有主导

地位,女性处于从属、被支配地位。在家庭中,父亲是绝对的一家之主,对于女儿的婚事有决定权。A感叹Jane的家庭如同维多利亚时代一样,暗示Jane对自己的婚事无法自己去选择。A的言语有两种可能的回应,B1的回答欠缺对Victorian family深层次意义的掌握,因此在惊讶的同时还追问原因,显然没有理解A话中之意。B2通过文化移情努力,对A来自英国的客观事实及维多利亚时代男女地位及当时社会家庭状况进行推测,顺应对方的思维,呼应了A对Jane婚事无法自己做主的唏嘘之情,即对Jane表示了同情,从关联上来说,也达到了最佳关联,实现了有效交际。

文化移情能力在交际主体摆脱自身文化所带来的思维定势的影响上起着积极的作用,能够促进本土文化和异质文化间双向协调、双向互馈和双向建构的机制的建立,有助于跨文化语境的构建并填补语言信息的空缺,促使交际双方在明示——推理过程中达到认知语境的和谐和言语的最佳关联。正如关联理论所强调的那样,这种认知语境的和谐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在跨文化交际中,双方时刻都要记住摒弃民族中心主义、成见和思维定势,认知、解读异族文化背景下的语言,设身处地的从交际对象的角度出发,从而圆满的达成交际目的。

参考文献:

- [1] Kuno S. *Functional Syntax: Anaphora, Discourse and Empath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26.
- [2] 陈希洁. 跨文化交际中语用合作原则的遵守与文化移情能力的培养[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24):116-120.
- [3] 何自然. 言语交际中的语用移情[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1(4):11-15.
- [4] 高永晨. 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移情的适度原则[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8):29-32.
- [5] Maureen Guirdham. *Communicating Across Cultures*[M]. Indiana: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99:163.
- [6] 高永晨. 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移情能力的价值与培养[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2):17-19.
- [7] 汤姆·布鲁诺. 和平传播:跨文化关怀的道德典范[A]. 萨姆瓦,波特主编. 麻争旗等译. 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C].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512-516.
- [8] 顾嘉祖. 跨文化交际[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18.
- [9] Sperber D 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95:270.
- [10] 苗兴伟. 关联理论对语篇连贯性的解释力[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2):9-14.
- [11] 杨静. 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移情产生的机制与表现[J]. 理论月刊,2010(1):111-114.
- [12] Michale Byram. *Culture Studie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M]. Lon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1989:56.
- [13] 魏在江. 英汉语篇连贯认知对比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75.
- [14] 齐艳. 认知图式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J]. 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33-36.
- [15] 朱筠笙. 跨文化管理:碰撞中的协同[M].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200.

On Cultural Empat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xt of Relevance Theory

YANG Chun-ch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1167, 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thinking models, dur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 both sides of communication are inclined to understand information in a way which is decided by their certain cultural background. Hence, the speaker's information may be misunderstood by the listener, which will lead to a failure in the realization of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Cultural empathy enables one side of communication to think on the other's side, thus understand what the other side cannot express directly or what he cannot comprehend thoroughly. In all, cultural empath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cultural context and the realization of optimal relevance.

Keywords: relevance theory; context; cultural empathy

(责任编辑:李开玲)